紙質文件

流 沙

文化什錦

城裡有一家紙品店，老闆是多年的老朋友了。最近他的店關門歇業了，一部分尚未售完的紙轉手給了一家文印店。多年老店關門，原因自然是經營難以爲繼。老闆說，四五年前，店裡生意慢慢變差，這兩年，有時一個月也做不了幾單生意。

老闆的紙品生意差，是與內地政府近年來推行電子文書有關。他說以前的紙大部分是政府機關來採購，而政府機關使用電子文書後，白紙使用量越來越少。

從白紙店關門到電子文書使用，這倒可以成爲一條邏輯鏈。說明政府推行電子公務「卓有成效」。但我所接觸到的事實並非如此。在一些內地機構，的確開始使用電子文書，而且政府還下了文，大約在二〇〇五年左右就開始實行了，要求公文報送必須採用電子文書形式。可我發現，不少單位報送公文時，同樣還要打印一份紙質文件，修改、批註等等，均在紙質文書上進行。似乎紙質文書並未減少。

一位在機關辦公室工作的朋友還告訴我這樣一件事。三年前，單位來了一位新領導，第一次送呈文件時，他按規定送達審閱的是電子文書。當時領導也沒說什麼，都在內部網上進行審閱。有一次聚餐，領導喝多了，席間說，現在當領導的不像個當領導的樣子，就說審閱文件這事，連張紙也沒有，你說這還是批閱文件嗎？

說者無意，聽者有心。辦公室主任聽了，覺得這是一件大事。第二天，所有報呈的文件全部改成了紙質文件。這位辦公室主任也因爲「辦事得力」得到新領導的賞識。

電子文書來無蹤，去無影，鼠標一點，即使有千百份文件也發出去了。但紙質文書就不一樣了，文件誰先看，誰先批，那是比天還大的「規則」，這是絲毫不能馬虎的事情。如果「一把手」對一份文件沒有看，也沒簽上「已閱」的字樣，那其他人是萬萬不能去看的，非得等到「一把手」看完了也簽完了才行。有時候，「一把手」不在單位，那也得等，非得等到領導回來才行，有些文件可能遲到一個月才到其他人的手裡，這也是正常現象。

紙質文書其實代表着一種「官威」，而電子文書挑戰的就是沉疴極重的官場「潛規則」。如果領導的辦公桌上，沒有紙質文件可批，那領導的優越感又由何體現呢？

於是乎，雖然電子文書推行了四五年了，但紙質文書仍然大行其道。很多地方，仍然還在實行文書「雙軌制」，一份是電子版的，一份紙質版的。而這份紙質版文書的存在，完全是爲領導「服務」的。

中美對話 成語吃香

楊百川

東西走廊

美國ABC電視台不久前播出美國內新聞，指出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於華盛頓揭幕，美國總統奧巴馬，特別代表國務卿希拉里，和財政部長蓋特納在致詞時，大秀中國成語，塑造對話友好氣氛。

希拉里致詞時說，她在二〇〇九年曾經用過一個中國成語：中美要「同舟共濟」，現在還有另外一個成語：「逢山開道，遇水架橋」，「今天我們在這裡就是要架設這樣的橋樑。」蓋特納則闡述了美中合作的重要，他引述奧巴馬的話表示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，能夠單獨應對二十一世紀的挑戰，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，能在閉關自守的情況下，有效地增進自身利益。蓋特納用中文說道「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」，並指出這表達了中美兩國有同樣的智慧看到這點，我不禁心有感觸，引用中國成語與古語，「似乎已成了美國高官的時髦」。記得在以往兩輪對話中，希拉里和蓋特納都曾分別引用過中國成語。

例如二〇〇九年首輪對話中，希拉里曾引述中國諺語「人心齊，泰山移」，強調美中兩國有必要找到共同點，合作因應二十一世紀共同挑戰；蓋特納則引述「風雨同舟」，形容美中關係。二〇一〇年的第二輪對話，希拉里引用中國成語「殊途同歸」強調美中走的路雖然不同，但目標相同。而蓋特納再次說道「風雨同舟」，並闡述了內涵。ABC新聞報道員有這樣的分析：用中國人熟悉的成語說道理，顯示了兩位奧巴馬內閣成員的良苦用心。從「人心齊，泰山移」到「殊途同歸」再到「逢山開道，遇水架橋」；從「同舟共濟」到「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」，希拉里與蓋特納「言辭寓意的層層遞進十分耐人尋味。」據我所了解，蓋特納曾在北京大學學過中文，他的中文名字是高逸然；而希拉里手下也不乏大批中國通。

今次第三輪中美戰略和經濟對話，中國方面由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特別代表：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、國務委員戴秉國，與美方的蓋特納和希拉里共同主持，爲期兩天。王岐山表示，中美歷史文化、發展階段、資源稟賦、現實國情不同，但經濟相互依存，高度互補，誰也離不開誰。圍繞確保經濟復蘇，中美政策措施既有互補，也有碰撞，但合作利益遠大於競爭分歧。戴秉國指出，中美兩國人民同住一個地球村，「你們在西頭，我們在東頭」，只要雙方看清中美關係大勢，下定決心，排除萬難，就一定能開創嶄新的相互尊重、和諧相處、合作共贏的大國關係之路。

從中美對話中，聽到美方官員頻頻用中國成語來溝通，顯現出當代世界的形勢，中方正上升，迫近美國，美國欲單方話事的時代已一去不復還了，今天的中國人，眞可以用上一句成語：光宗耀祖！

神州校園「夜貓子」

行 平

繽紛華夏

爲改變大學校園普遍存在的「夜貓子」惡習，北京、廣州、重慶、南京、長沙等四十座內地城市的衆多大學，正宣導「早讀、早餐、早鍛煉」活動。

「夜貓子」，比喻喜歡熬夜的人，而大學較爲寬鬆的管理環境，正好成爲「夜貓子」的溫床。今年四月，廣州某大學對一千多名大學生進行了問卷調查，發現有「熬夜」和「習慣性賴床」的大學生分別佔六成六和將近四成八。而南京某大學一項關於大學生睡眠的抽樣調查則顯示，該校只有百分之四點五的大學生晚上十一點前入睡，晚上十二點後就寢的大學生則多達五成六。

上網聊天、玩遊戲、看球賽、看電影、拍拖、泡吧、唱K、打牌、煲電話粥、忙社團活動……精彩的世界誘惑越來越多，令大學生熬夜成癮，「夜生活」時間越來越長。有的大學生從晚餐後至睡覺前的「夜生活」時間，達到八小時甚至更長，堪比上班族一天的工作時間。臨近期末考試，不少大學生「臨急抱佛腳」挑燈夜讀，更壯大了「夜貓子」隊伍。

雖然，一些大學學生宿舍夜晚有定時熄燈斷電的規定，但「夜貓子」們總有辦法「鑽空子」熬夜。南京某大學大二學生高同學說，以前宿舍斷電後，枱式電腦就用不了，無法熬夜上網；但是現在不同，手提電腦、手機日新月異，只要給這些設備充足電，即使宿舍斷電，同學們仍可繼續上網、玩遊戲、看電影。習慣了熬夜的大學生上午上課總愛打瞌睡，有的甚至曠課在宿舍睡懶覺，嚴重影響學習。

很多人誤以爲「熬夜後第二天多睡一下就好了」。但專家指出，晚上十一時到翌日凌晨三時是人體的經脈運行到膽、肝的時段，這兩個器官如果沒有獲得充分的休息，會對身體造成極大損害。

爲鼓勵學生早睡早起，鍛煉身體，摒棄熬夜陋習，清華大學、中國人民大學、北京師範大學、華中師範大學、華南師範大學、四川大學等許多內地大學，陸續宣導學生參加「早讀、早餐、早鍛煉」活動。與此同時，越來越多「夜貓子」大學生認識到熬夜的危害，在學校和家長的引導下，正積極邁向「早生活」。

早前，華南師範大學上百名學子共同發出「早生活」宣言：「我要每天早讀半小時！」「我要每天都到學校飯堂報到！」「我要每天堅持跳十分鐘健身操！」……最近，南京農業大學校園颳起了「太極風」，一些早起晨練的大學生在操場組成太極方陣鍛煉身體……

如今，不少大學生嘗到了早睡早起的甜頭。山西大學不少參加早鍛煉的大學生紛紛道出「早生活」的好處，其中一位學生說，他每天都堅持早起參加早鍛煉，明顯感覺早晨上課精力更充沛了。在陝西讀書的大三學生小琛，現在每天七點起床，吃完早餐到教室或校園一角早讀，他感覺自己的記憶力比以前好多了。

「貴在堅持」是一些踐行「早生活」的大學生總結出來的「秘訣」。海南大學大四學生吳越，在邁向「早生活」的初期感覺很痛苦，早上按掉鬧鈴後還是很想睡覺。但他知道早起鍛煉可增強體魄，於是堅持了下來。現在，早起已成爲了他的一個生活習慣。

如今，一些過上「早生活」的大學生，正身體力行，言傳身教，帶動更多的同學邁入「早生活」。

陶成章

楊渭生

人與事

今年十月，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。回顧百年革命歷程，有一位重要人物非常值得紀念，這就是辛亥革命元勳之一陶成章。

陶成章（一八七八——一九一二），字煥卿，浙江會稽（今紹興）陶家堰人。自幼聰慧過人，六歲入義學，十五歲爲塾師。從年輕時起，就是一位精明能幹的人才。

陶成章素有大志，談革命，重實踐，在清末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中頗有影響，在聯絡會黨基層群衆以圖革命進取，他是「轉運之樞紐」。一九〇〇年義和團運動時，十八歲的陶成章即欲行刺西太后，親赴東三省，並遊歷蒙古東西盟。第二年，又到北京，觀察政局形勢。他敏銳意識到起義非由陸軍着手不可，曾屢謀入陸軍學校，以作進行革命的階梯，但未如願。一九〇二年，陶東渡日本，進清華學校，繼入成城軍校。當時留日學生監督汪大燮窺知陶成章有革命思想，畏他學習陸軍，多方阻難，並用計騙他回北京，使他不能入成城軍校。陶對此極爲氣憤，革命之志益堅。在此期間，陶成章先後結識龔寶銓、魏蘭、黃興、楊卓林等革命志士，參加了留日學生的愛國團體「軍國民教育會」，並與上海的革命同志相呼應，激情投入反清革命運動，以推翻清王朝爲畢生大事。

一九〇三年冬十二月，陶成章與魏蘭回浙江聯絡各處會黨。得《杭州白話報》主筆孫翼中介紹，先後兩次到仁和縣監獄與當時被捕在牢的「白布會」首領濮振聲洽談。經濮介紹，他用化名陶起東到桐廬招山埠了解各種秘密會黨，遍訪桐廬、分水各村落「白布會」。魏蘭在雲和創辦先志學校（近代浙江處州府有學校自此始）。陶成章在該校任教兩月，又同魏毓祥（魏蘭堂侄）等與在溫州活動的龔寶銓會合。陶、龔又到嘉興，與敖嘉熊結識。陶把魏蘭介紹給敖嘉熊，推舉魏做溫台處會館的「總理」，進一步開展會黨聯絡工作。其後，溫台處會館解散，其中有些人即轉移到紹興大通學堂。此在期間，陶成章傾注全力於浙東、浙南一帶聯絡各地會黨，組織聯會各種可能聯合的革命力量，包括聯絡沈榮卿、張恭、周華昌，親至東陽玉山尖聯絡大開和尚等，把民主革命的新內容傳入各會黨，將分散孤立的會黨勢力聯成一片，爲浙江辛亥革命播下火種，奠定群衆基礎。爲響應黃興的「長沙起義」陶成章親赴金華、蘭溪等地，招呼會黨，布置一切。一九〇四年四月，陶成章寓於「杭州白話報」館一個多月，著《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》，並函託陳蔚向有關志士借錢刊印。這年冬，陶成章在上海加入由「軍國民教育會」發展而成立的「光復會」（蔡元培爲會長），並在往後的革命活動中逐漸成爲「光復會」的實際領袖，他是革命的實幹家。在陶的影響下，紹興商學兩界革命志士和各屬會黨首領紛紛加盟入會。「光復會」在浙江有較大發展。

一九〇五年正月，陶成章與魏蘭相晤於日本東京，並與黃興、秋瑾等人商議進行革命活動的辦法。爲適應當時中國的實際，深入下層群衆聯絡鼓動，陶成章在東京學習「催眠術」，並撰有《催眠術精義》（一名《催眠術講義》）。同年夏返國，設講習所於上海。魯迅說陶成章窮得不堪，在上海自稱「會稽先生」，教人「催眠術」以餬口，藉作革命活動的掩護。同年秋，陶成章與徐錫麟創辦紹興大通師範學堂，設體操專科，從事軍訓練，招集金華、處州（今麗水）、紹興等地會黨成員入訓，把大通學堂學生大多吸收爲「光復會」會員，擴展「光復會」組織。此後，僅秋瑾在該校就發展六百多個「光復會」員，集聚革命力量，「大通學校遂爲草澤英雄聚會之淵藪。」

一九〇六年夏，陶成章往返於杭州、蕪湖，「聯絡閩、皖各同志，自稱五省（指浙江、福州、江蘇、江西、安徽）大都督，分浙東、浙西、江南、江北、江左、江右、皖南、皖北、上閩、下閩爲十軍」。此「五省十軍」，實即《龍華會章程》（《革命協會章程》）上講的「五省十路」。此爲陶成章致力於聯絡會黨，以促進民主革命運動的一大步驟，雖未成功，亦屬他的重大歷史功績之一。同年，陶成章再次東渡日本，加入「同盟會」，繼秋瑾之後爲浙江主盟人。曾一度擔任「同盟會」機關報《民報》的編輯、發行人。在同保皇黨論辯中，他旗幟鮮明，鬥爭很堅決。陶成章在東京，與章太炎、魯迅等人關係密切，爲避開日警搜查，陶成章曾把一些秘密「文件」寄存於魯迅住處，魯迅參加「光復會」也是陶成章介紹的。一九〇七年徐錫麟、秋瑾在皖浙起戰失敗後，陶成章逃往東京，聯絡印度、緬甸等地的愛國華僑討論革命大計。同年，陶成章與張繼等人參加「社會主義講習會」，在日本清風亭演說，「提倡社會主義」。同時，又與浙東金華、衢州、嚴州、處州等地的革命志士密商革命進取之計。一九〇八年春，陶成章作函介紹王文慶到浙江各府聯絡。陶成章則與張偉文赴青島，擬仿大通學堂的辦法，籌組震旦公學，未成。返上海，旋回日本。不久，陶成章再與張恭攜帶炸彈返國。那時，陳其美、莊新如在上海，遂與共商進行革命方法。

陶成章爲了發動愛國華僑參加革命，籌備起戰經費，曾多次到過南洋群島各埠。見諸記載的，主要有三次：第一次是一九〇八年八月至一九〇九年秋，這次歷時最長；第二次是一九一一年一月至「三・二九」廣州起戰之前；第三次是一九一一年六月至八月。他到新加坡，在僑辦的《中興報》發表駁斥保皇黨的文章。到緬甸，任仰光《光華日報》主筆，還把他的名著《浙案紀略》的部分書稿（有關革命黨人鬥爭事迹）匿去實名，在《光華報》發表（《浙案紀略》這一名著，現存最早版本爲一九一六年魏蘭補註本）。在這期間，陶成章又先後在印尼泗水創辦漢文新書報社，在上海與尹銳志姐妹組織銳進學社，出版《銳進學報》，在日本辦教育雜誌，一度曾準備辦《光復報》、《光復雜誌》，等等。這些，都是爲了開展宣傳，推進革命。在這過程中，因經費問題和當時革命派內部派系原因，陶成章等人與孫中山產生誤會鬧翻，竟演成「光復會」從「同盟會」中分裂出來，但在對付清政府方面，仍並肩戰鬥，共同對敵，不愧爲民主革命的勇士。

一九一一年，浙江省城光復，陶成章從南洋經香港回杭州，革命黨人推舉他爲總參謀。他爲革命忘我奮鬥，設籌餉局和「光復軍」總司令部於上海，協助浙軍攻取南京，極力主張北伐，直搗清王朝的巢穴。由於當時革命派內部派系爭權，陶成章這位很有個性的革命元勳必然橫遭大忌，章太炎就曾告訴過陶成章這個問題的危險性。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凌晨，陶成章果然不幸被暗殺於上海法租界廣慈醫院。魏蘭《陶煥卿先生行述》（一九一二年油印本）對陶遇害有詳細的記載。孫中山曾以「萬急電」命令上海都督陳其美查明陶案，並在《致浙江都督府令》中，表彰陶成章對革命「實有巨功」。其實，暗害陶成章的主謀者正是陳其美，陶案自然不了了之！陶成章身後，其靈柩歸葬杭州西湖風林寺前，其後築有「陶社」（華僑捐建之屋）。

今陶墓遷於杭州市南天竹陵園。紹興東湖亦有「陶社」，孫中山曾親臨致祭，並親筆題詞：「煥卿先生，氣壯山河」！陶爲辛亥革命立有巨功，彪炳史冊。

陶成章

名人與垂釣

穀士

文化經緯

垂釣，是一項獨具魅力的娛樂活動，古往今來，不少名人樂此不疲。

晉人詩人陶淵明隱居時，垂綸養性，怡然自得。有一次，他得知好友鄭次都釣魚去了，便立即趕了去，拿起魚竿垂釣，並賦詩曰：「鄭叟不合，垂釣川湄，交酌林下，清官究微。」

唐代大詩人李白喜歡釣魚，他常「閒來垂釣碧溪上」。一次，他到安徽貴池遊覽，釣興大發，坐在河畔江祖石上，垂綸碧流，瀟灑脫俗，怡然自得。相傳，著名的太白釣台正緣於此。

唐代詩人張志和被貶官隱退時，垂綸江湖之上，相傳十年不歸，自稱爲「煙波釣徒」，正如他在《漁歌子》中所流露的「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。青箬笠，綠蓑衣，斜風細雨不須歸。」

唐代大詩人柳宗元是位垂釣高手，「千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蹤滅。孤舟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。」寥寥幾筆，勾畫出了一幅寒江獨釣的畫卷，表現出詩人濃厚的釣魚興趣，可謂是垂釣近痴的寫照。

宋代的陸游晚年一直以垂釣、創作爲樂，一生作釣魚的詩詞有七百多首。他是一位夜釣高手，時常「江邊有月夜投竿」。陸游還諳熟傍晚和雨後釣魚，有詩曰：「日落苔磯閒把久，雨餘篷舵亂堆蓑。」

明太祖朱元璋愛好釣魚，不過釣技太差。一次，他攜才子解縉去釣魚，可過了好長時間，還沒有一條魚上鈎，朱元璋面露慍色，解縉靈機一動，獻了一首詩曰：「數尺絲綸落水中，金釣拋雲永無蹤；凡魚不敢朝天子，萬歲君王只釣龍。」頓使朱元璋由嗔轉喜。

明代江南才子唐伯虎是一位寄情煙波的釣客，從他的作品中便可見一斑，「煙水孤篷足寄居，日常能辦一餐桌。問渠勾當平生事，不弄綸竿便讀書。」

清代乾隆皇帝愛好旅遊和垂釣。他下江南時，曾先後在杭州西湖、揚州瘦西湖釣過魚。至今，瘦西湖中還留有乾隆皇帝的釣魚台。

葉劍英元帥與釣魚有着不解之緣，曾留下「輕波垂釣叟，昔日弄潮童」的名句。一九八三年，中國釣魚協會成立，葉帥擔任了協會名譽主席，爲推動我國釣魚運動事業的發展作出貢獻。

諸葛烤魚

董國賓

飲食男女

諸葛烤魚，這名字一看就內涵飽滿，意味幽遠，再想想那撲鼻的焦香味，不愛上它才怪呢。

不久前，有機會去了重慶市萬州。在那裡，我吃到了最正宗的諸葛烤魚。果不其然，是一道名副其實的可口佳餚。

我就餐的諸葛烤魚店，位於繁華街心。店內裝飾古樸，格調清雅，有鬧中取靜的感覺。來就餐的客人，個個露出了饞相，迫不及待地碰杯舞筷，好一番享受呢。

諸葛烤魚，源於重慶市萬州，劉備向諸葛亮託孤的白帝城附近。這魚非諸葛亮所烤，準確地說，乃其所愛，故名諸葛烤魚。想想，神機妙算的諸葛亮都最愛此「烤魚」，誰還能說些什麼呢。顯然，諸葛烤魚始於三國時期。據說，諸葛亮身出隆中後，從建國到北伐，身邊始終帶着烤魚廚子。推薦之下，軍中府中，讚不絕口。烤魚成了每逢聚會必上的一道菜，最終被定爲蜀國國菜。諸葛亮聰明絕頂，會不會也與他的飲食習慣有關呢？

諸葛烤魚，非傳統意義上的烤魚。它做法獨到，融合了醃、烤、燉工藝之精華，配料特別，營養豐富。鮮、香、爽、嫩、麻、辣兼有，口感濃烈，回味無窮，深受人們喜愛。

地道的重慶市萬州諸葛烤魚，做法非常講究。一般選擇一公斤左右的魚，去鱗後從背部剖開，去除內臟，體表打一字花刀，加入特別調料，醃製不少於二十分鐘，撈起瀝淨，置於炭爐上燒烤。宜微火慢烤，不停地翻動，以免局部烤糊。烤魚九成熟，魚體橙黃，肉嫩焦香，再刷一層油，充分浸入魚體內，撒些孜然粉，略烤即可。然後涮味入鍋，將烤魚放入秘製湯底的特製容器中，輔以豆腐、竹筍、蔬菜等，上面撒些香菜，現煨現吃。

這就是地道的川中美味——諸葛烤魚。據說，燉魚的天然湯汁裡，精選了三十多種中草藥及調料呢。

諸葛烤魚，看上去外皮香脆，色澤金黃，湯汁紅亮。吃起來肉質細嫩，香味濃郁，辣而不燥，油而不膩，還繚繞着一股淡淡的回味無盡的焦香味，眞是一道不錯的美食。

張愛玲的脾氣

王 羽

文史叢譚

二〇〇八年受上海文化出版社之邀寫一本《張愛玲傳》，從天津到上海反覆搜刮着張愛玲的痕跡。一本書寫下來，彷彿陪着她走完了密密匝匝的一生。到如今，時光流逝，這本書已經塵埃落定，而我內心深處彷彿代她所做的反省卻一刻未停。

在宣揚女權的今天回頭看去，其實對孩子來說，還是父強母弱的家庭模式比較容易幸福穩定。張愛玲的父親被顯赫的貴族家庭背景命定爲一個徹頭徹尾的「遺少」，只能以抽鴉片、吃花酒、玩女人來塡塞精神的空洞。偏偏母親卻是一位堅強獨立的新女性，敢吵架敢出走乃至敢離婚。結果是無辜的張愛玲屢屢被他們之間的戰爭所累，耗成了終生不愈的內傷。

被父母傷害過的孩子不太容易再相信世界，她只相信自己，相信當下，相信掌心裡握着的東西。所以她懷抱着沉重的不安全感，時時覺察出周遭無所不在的「惘惘的威脅」；她極端地以自我爲中心，從未突破黑洞般的「孤島」心理；她急於求成不管以後，好像總被不可預知的命運緊追不放，遲了一切都來不及；她感念物質卻身心虛無，暖起來如春陽，冷酷時連自己也不肯放過。張愛玲自始至終都是個受傷的孩子，沒人出手救她，或者說這世上能救她的只有她自己，又或者說受了這樣的傷根本無藥可救。她不顧一切要出小說集，絲毫不考慮政治氣候和時代背景。她抓住了一點愛就飛蛾撲火，根本不計較前途會怎樣。她愛聽市聲，愛看電車，愛葱綠配桃紅，愛冰淇淋，你以爲她活得風生水起，其實她徒有生活的興致，卻沒有生活的期待。最結結實實的一點就是她不愛孩子，不看好未來，在《造人》中不惜殘忍地說：「我們的精力有限，在世的時間也有限，可做，該做的事又有那麼多——憑什麼我們要大量製造一批遲早要被淘汰的廢物？」她自己就曾經是母親眼中一個不會微笑、不會待人接物、不會打理家事的廢物。當一個人被最近的親人乃至最唇齒相依的自己打敗，她還能對什麼有信心呢？終生受困於過度的自誇與自鄙，她至死沒能打通她絕對擅長和絕對不擅長的兩極世界。

從某種程度上說，她一生都在縱容自己早在一九三九年的《天才夢》中就充分意識到了的「天才的乖癖」。她到晚年還對十九歲時《西風》雜誌徵文初獲首獎、後得末獎的往事耿耿於懷，眞是記仇。她初登文壇之時，《紫羅蘭》不肯將她的《沉香屑 第二爐香》一期刊畢，她便投向《萬象》，《萬象》登了傅雷的文章批評她的小說，她又轉向背景複雜的《雜誌》，個性也是太自負太要強了。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台灣，台大外文系的學生送她雜誌，她卻不要，說現場翻翻就可以，這種輕飄飄的態度，眞虧得那批後來成了作家、文學研究專家的青年人還尊她爲祖師奶奶。她姑姑弟弟那麼熱切地和她聯絡，她不僅始終不肯回大陸探親，連通信也是帶搭不理的。冷漠，自私，急功近利，惟我獨尊，不擅長換位思考，不照顧別人的感受，可是也正因爲這些改不掉的缺點，她才是沒被掉包的張愛玲。

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《對照記》最末的「跋」中，她曾寫一首詩送給自己那幀手持報紙的小照。

人老了大都
是時間的俘虜，
被圈禁禁足。
它待我還好——
當然隨時可以撕票。
一笑。

這便是她對生死的最後審視，生不過是做朝不保夕的人質，死也不過是一勞永逸的撕票，人到結局，只是用一生掙扎蕩漾換來的「一笑」。

我的耳邊一直在迴響着一首英文歌的旋律，名字和歌者都忘記了。只記得主人公坐在電影院裡看瑪麗蓮・夢露的電影，一直惋惜地在怪自己，我什麼也做不了，因爲我只是那個坐在電影院後排的小男孩。